

21
552.20
14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小叢書第三種

我國經濟建設之途徑

吳半農著

吳半農著

我國經濟建設之途徑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 日初版

我國經濟建設之途徑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吳半農

發行人 劉百閱

發行者 重慶磁器街
中國文化服務社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我國經濟建設之途徑

目次

(一) 我國經濟建設之制度問題.....	一
(二) 我國經濟建設之目標問題.....	七
(三) 我國經濟建設之基本政策問題.....	一八
附註.....	二八

我國經濟建設之途徑

我國經濟建設有一個先決問題亟待解答：即今後建設究竟要走什麼途徑？這個先決問題如果事前沒有獲得確定的答覆，不但整個的建設計劃無從談起，即各種經濟政策亦將無法討論。茲就我國經濟建設的制度問題、目標問題及基本政策問題三方面，分別論述如下。

一 我國經濟建設之制度問題

民主主義
節制私人資本
發達國家經濟

我國經濟建設須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這可以說是目前國內各黨各派所公認的國策。(一)但民主主義的本質到底怎樣，則直到現在還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人說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主義」。(二)有人說「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但却與歐美一般的社會主義不同」它是「藉着合目的意識的經濟政策——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而和平地實現」。(三)有人說：「民主主義仿效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規模組織與最高度的生產力，發展農業工業，但無資本主義社會之弊害」。(四)有的說：「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是與資本主義類似方法而不同目的；同時又與社會主義相同目的而異其手段」。(五)有的說：「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有時代性的，和

我國經濟建設之制度問題

環境的適應性的，在大貧與小貧的社會階段中，解決民生的辦法是發展生產，而用節制資本——再加上平均地權——的辦法，以防制資本主義的發生，但並非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到了生產發展進入「大家平均，沒有貧富」同時人人認爲勞動乃倫理問題，而非功利問題的社會階段中，三民主義的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六）有的說民生主義經濟建設的途徑「不妨稱爲『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七）有人認爲民生主義的公式應該是（這裏「十一號是統一的過程」）

民生主義——發展生產——節制資本——平均地權

「這就是說，民生主義是資本主義，同時又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因爲它本質上要求資本主義在最能順利的條件下成長和開展，但同時又不是資本主義，因爲它強烈地要求「避免」或「預防」資本主義，要求實現資本主義之對立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建設的基本方式是革命民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八）又有人認爲民生主義「不但不否認資本制度，而且以最大闡切而發展資本制度。」「國家資本制度就是中山先生發展中國資本制度的最高途徑。」然而民生主義「不是如一般人的觀念——「約束」於資本主義，相反地乃是一種「識時難」的衝破社會主義門戶的發展領導。」「發展國家資本制度亦未可概念化而爲國家資本主義。」（九）此外，有的說民生主義簡直是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有的說它是「一種附保留的資本主義」有的說它僅僅是一種社會政策，但同時又有人說它是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有人索性說它是一種無所不包的主

義。(一〇)這種種不同的解釋，只能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其間孰是孰非，我們在此是不打算加以評定的。我們覺得，在決定我國經濟建設的大政方針之憲法上，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之發揚，要比空洞的主義之討論重要得多。我們與其做些民生主義的「分類工作」，執著空談，實實把它的內容確定並充實起來，使其真正成爲今後經濟建設的明確路線！

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大同世界」或共產社會，而走向這個目的，的當前的具體辦法，則爲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二者之中，平均地權是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性質較爲特殊，這裏不擬討論。至於節制資本，則有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積極方面則是「發達國家資本」。這兩大政策原係一事的兩面。二者實不可分，但從建設的意義上說，積極發達國家資本則較消極節制私人資本尤爲重要。我國私有企業本來不甚發達，經過這次長期的戰爭，更已破壞殆盡，我們今天討論節制資本，與其說是爲了調整現在，毋寧說是爲了防厥將來。中山先生所謂「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一)者，便是這種思慮預防的寓意。爲要不使我國經濟的發展「再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覆轍」，對於國內私有資本自始即加以節制，固然是必要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辦法還是在於加緊發展國家資本，以代替私人資本。只有到了國家資本在國內各種重要的經濟活動中占到了絕對統治的地位，我國的經濟才可保證不走歐美私有資本制度的老路。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而且實際上在一產業落後，經濟基礎薄弱的國家裏，如果只節制私人

資本而不同時加速發展國家資本，則其結果勢將等於阻止國民經濟的發展。這和三民主義的建國原則根本背道而馳了。這一點，中山先生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十分重視，所以他一則曰：『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一二）再則曰：『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方可解決之。』（一三）

這種發達國家資本或製造國家資本的政策，至少從經濟建設的意義上說，是應該當作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和中心工作看待的。我國的國民經濟能否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迅速發達起來，固然要看國家資本發展的速度和程度而定，就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能否做到「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也是要看這個製造國家資本的政策能否認真推行而定的。

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中山先生回答說：『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言製造國家資本之大要。』（一四）「實業計劃」一書中，也有一段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今茲所論，後者之事屬焉。』（一五）由此可知，中山先生的製造國家資本的政策實即發展國營事業的政策，他的

「實業計劃」亦即一部發展國營事業的計劃。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如果認真實行起來，國營事業在整個的經濟發展中是要占到絕頂重要的地位的。

我國經濟建設之須以國營爲重心，不僅在節制資本的意義上說應該如此，而且從世界經濟的發展階段和國內的實際形勢看來，也必需如此。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目前這個階段，其所具自由競爭之特質業已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原料的獨占和市場的壟斷。這一轉變，過去還有許多學者認爲是暫時的變態現象；到了今天，連保守的經濟學界都不得不提出「不完全的競爭」或「壟斷性的競爭」等名詞，以圖改造經濟理論了。（一六）資本主義的這一壟斷階段，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爲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或「垂死的資本主義」。（一七）「因爲帝國主義使資本主義矛盾的緊張程度達到極端，達到頂點，接着便是革命的開始。」（一八）「穩健」的經濟學家雖然還不承認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但稍微開明的人已經逐漸了解，目前的恐慌決不是偶然之事。（一九）除非產業和整個經濟重新改造一次，恐慌的不斷光臨恐怕終究是不能免的。（二〇）而且事實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些矛盾已使社會主義的革命在俄國獲得勝利；意德兩國因爲革命危機的逼近已先後放棄民主政治而實行了法西斯主義；即在民主國家，自由放任主義亦已日趨沒落而漸代之以政府統制和管理了。縱觀全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組織雖互有不同，但集體經濟（collective economy）之抬頭却是目前普遍的現象。現在歐洲正燃燒着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烽火，亞洲方面，我中華民族亦正與日本帝國主

讀者作殊死戰，以求國家的獨立與民族的自由。這次的世界戰爭，其結果如何，目前雖尚不能預測，但今後各國的經濟必更趨於集體化，却是可以斷言的。在這樣一個世界環境中，如果還有人醉心自由放任的陳說，主張我國仍走個人資本主義、老路，把經濟建設的重担放在國內擄弱散漫、凋殘零落的私人資本身上，冀其自行發展，則何異癡人說夢！時至今日，我們只有把一切經濟力量集中在國家手裏，由國家依照遠大的目標，整個的計劃和堅定的政策，加速建設，限期完成。我國的經濟才有可能跳出殖民地的地位而踏上獨立自主的途徑。事實上，我國自抗戰以來，國營事業和統制機構都已有相當的基礎，而最重要的，我們今天已經有了一個強有力的統一政權；這些重要的事實都在說明：目前我國「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一一)不但必需而且是可能的。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要問：這樣「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而建設起來的新中國將是怎樣一種社會呢？我們可以簡單明瞭而具體地回答說：將是國家資本制度。這種國家資本制度不必而且不應抽象化或概念化爲國家資本主義，因爲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政策是以預防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爲鵠的，只要民權主義能夠徹底實行，不使政權落在少數特權階級之手，它是可以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社會的。但同時這個國家資本制度不必且不應抽象化或概念化爲國家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因爲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政策是在我國舊有的私有財產之基礎上實行的，它雖有和平渡入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可能性，但卻沒有這種轉變之必然性。從國家資本制度到社會主義的社會，中間仍須經過許許多多的困難和奮鬥。然而，那畢竟是將來的問題。我們目前還只

有爲實現民主主義的國家資本制度而努力。而這種國家資本制度能否迅速建立，首先就是要看國家事業能否迅速發展而決定的。

二 我國經濟建設之目標問題

徐廣市工業

其次我們討論到我國經濟建設的目標問題。這裏我們要問的是我們今後建設的基本任務究竟在那裏？目前世界上依照計劃迅速達到建設目標的國家應當首推蘇聯和德國。現在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這兩個國家的先例。

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負有六個基本的任務：（一）把落後的，甚至是中世紀的技術國家轉移到新的，現代的技術之大道上；（二）把蘇聯從農業的，由資本主義國家任意支配的弱國變爲工業的，完全脫離世界資本主義之支配的強國；（三）把蘇聯變爲工業國家，以便徹底消除資本主義的份子，擴大社會主義經濟的戰線，並建立消滅蘇聯國內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四）在蘇聯建立這樣的工業，這種工業能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重新武裝並改組整個的工業、運輸和農業；（五）把小的和分散的農業轉移到大規模的集體農莊的大道上，俾能保證社會主義在鄉村中的經濟基礎，並消滅蘇聯資本主義恢復的可能；（六）在蘇聯建立一

切必要的技術上和經濟上的基本條件，來盡量提高國防能力，俾能組織堅決的抵抗以對付一切外來的軍事干涉和軍事進攻的企圖。(二)這六個基本的任務歸納起來便是蘇聯經濟建設的兩大明確的目標：(一)加強蘇聯的國防能力，(二)把蘇聯變成世界上技術最進步的國家之一，並使其在經濟上和技術上能夠獨立。(三)

納粹德國的經濟復興計劃是以軍備經濟 (Wehrwirtschaft) (二四) 為重心。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登台的時候，德國還陷於經濟恐慌中，水深火熱而不能自拔；官方登記的失業工人達六百萬，沒有登記的失業工人達一百萬。當時希特勒提出了消除失業、恢復繁榮的口號，第一個四年計劃實施的初期，公共工程 (Public Works) 的興築便被看做「工作創造方案」 (The Work-creation Program) 的主要內容。不過同時軍需工業的重整亦已在暗中進行。到了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退出軍縮會議並恢復徵兵制度，重整軍備和擴充軍需工業遂一變而成爲四年計劃公開的中心工作。(二五) 一九三六年九月，第一個四年計劃還沒有結束，第二個四年計劃又付諸實行。這次的計劃除了繼續擴充軍備外，並以最大的努力增加農業生產，開採劣質礦砂製造人造原料 (Synthetic raw materials) 以求糧食和若干基本原料的自給。(二六) 可知德國兩個四年計劃的目標也不外是加強國防力量 and 力求經濟自給。

蘇聯和德國，無論從政治制度、經濟組織，或在施行經濟計劃時的物質條件、技術基礎和經濟發展情形說，都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然而這兩個國家却同樣是在艱苦的環境中，依照預定的目標，在極短的期限內完成了建國

的任務，成爲世界上頭等的強國。我們現在正要在艱苦中把我們的國家迅速造成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的強國。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個國家無疑地都是我國經濟建設的最好榜樣。尤其是蘇聯，在繼續帝俄凋殘零落，疲於戰爭的落後的國民經濟之基礎，又復受到長期的國內戰爭和國際武裝干涉之破壞，國力的窮竭實已達到絕境；以後經過新經濟政策的施行和國家工業化方針的實施，國家的元氣雖已漸見恢復，但到一九二八年十月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國內經濟和技術仍然十分薄弱，而國際資金援助又非蘇聯所能希冀於萬一，然而蘇聯不顧一切，卒在舉世的冷笑熱罵中開始執行了目標遠大的五年計劃，並於四年零三個月中完成了這個計劃。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即能驕傲地舉出數字和事實，證明蘇聯「在基本上已完成了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在工業、運輸和農業下面奠定了現代新技術的基礎，「並已做到將國防能力提高到應有的程度。」（二）

七、目前我們的經濟建設條件，就國際同情和援助來說固然頗爲優越，即從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上言，也要比那時的蘇聯稍勝一籌。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不但說明我們今後的經濟建設有確立遠大目標的必要，同時也啓示我們有達到這個遠大目標的可能。

「國家落後了一百年，因爲它的落後而受到致命的危險，所以我們不能不鞭策它向前邁進。只有邁進才有可能使國家趕快在新式技術的基礎上重新武裝起來，最後踏上一「康莊大道。」」（二八）斯大林這段富有警惕性的話實不啻爲當前的中國說。中國過去百年間，弱肉強食，任人欺凌，根本的原因即在於經濟落後。這次的

抗戰犧牲之大，曠古未有。戰爭未爆發前，我們不但從未求戰，而且委曲求全，時刻避戰，然而敵人鑒於我國是一個弱國，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畢竟無可避免地輪到我們的頭上。這次的戰爭，從敵人說是孤注一擲，從我們說是死裏求生。我們不是尼采（Nietzsche）的信徒，說戰爭是人類高度發展的最有價值的工具，是達到「超人」所不可缺少的東西，然而我們經過這次的教訓後，當能痛切認識，一個經濟落後，國防薄弱的國家，實不配侈談和平。我們只有仿效蘇聯，迅速「在新式技術的基礎上重新武裝起來」，才能談到維持國家的獨立自由，並成爲世界和平的支柱。列寧曾經說過一句驚心動魄的話：「戰爭是不憐情人的，它以毫不留情的嚴厲態度提出問題：或者滅亡，或者也在經濟上趕上和趕過先進的國家；或者滅亡，或是開足馬力猛勇前進。」（二九）中國要不滅亡，也只有以最大的決心和努力從根本上加強國防力量，並把我國變成世界上技術最進步的國家之一，使其在經濟上和技術上能夠獨立。舍此之外，決無其他發奮圖存之捷徑。

過去我國的文壇上對於經濟建設問題曾有所謂重農重工之爭（三〇）。抗戰發動後，又有國防與民生的討論。（三一）重農重工之爭早成過去。最近國內雖有極少數的文人提出「以農立國」的口號，並因此引起文壇上一個不甚重要的爭論（三二）。但時至今日，除了倡說「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日本軍閥和財閥以及響應「東亞協同體」的少數漢奸敗類外，決沒有一個人對於中國工業化的必要還持異議。就是主張「以農立國」的楊開道先生也鄭重申明「中國應該工業化，應該機械化，就是農業也應該工業化，應該機械化。」（三三）可知爭論

的焦點已經根本不存在了。至於國防經濟與民生經濟的緩急輕重問題，則直到現在，論者的意見還沒有完全趨於一致。我們對於這些意見自沒有在此提出討論的必要。但爲正確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計，有兩個基本觀念却是應當加以說明的。

從廣義的國防來看，我們應當知道，國防經濟與民生經濟之間實無明確的界限可分。現代的戰爭是魯屯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所謂「全體性戰爭」（Totale Krieg）只要一經爆發，「根據它的本質就真正需要作戰民族的全部力量。」（三四）故一國的國防能力不僅是指該國的武力而言，而是要把整個的國力計算進去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經濟力即是戰鬥力，二者實不可分。一個真正強盛的國家，其經濟生活和戰鬥生活原是應當一致的。（三五）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不敗於協約國的武力而敗於英國的經濟封鎖政策，就說明了經濟力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希特勒的兩個四年計劃，除了整軍經武外，同時還要在無辦法之中去想辦法以謀經濟的自給，也是因爲德國痛定思痛，深切了解現代戰爭的全體性之故。可知從廣義的國防來說，國防經濟和民生經濟實係一事的兩面，即使把它們分別開來，二者亦實係相成而並不相抵。不過從狹義方面來說，我們却應當承認，直接增加國防力量的軍需事業和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民生事業畢竟意義不同而不能混爲一談。尤其是在一國的物力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則緩急輕重之間實大有權衡的必要。於是問題便發生了：如果一個國家對於這兩種事業不能兼籌並顧的時候，到底應先發展那種事業呢？我們根據「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的淺

近常識，可以確定地說，應先發展軍事事業。德國戈林將軍（General Goering）那句有名的「槍砲比牛油更要重要」的口號，決不能作為異端邪說看待。正統派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很早就在那富論中說過：「國防要比殷富（opulence）重要得多。」（三六）戈林將軍不過把這句老話用有力的詞藻重新粉飾了一週罷了。

雖然「槍砲」和「牛油」、「國防」和「殷富」儘管在國防的意義上有直接間接之分，因而在發展的程序上有緩急先後之別，但二者所需的技術和經濟的基礎却是大致相同的。沒有健全的技術和經濟基礎，「槍砲」固無從製造，「牛油」亦不易生產。「國防」和「殷富」同樣是談不到的。拿我國實際的情形來說，抗戰以前長江下游的日用品工業確已有相當的成就，抗戰期中後方的兵工業也已有飛躍的進展，但究以過去的工業化沒有奠定真正的基礎，比較重要的機器和原料都要仰給海外，因而兩種工業同樣受到嚴重的限制而不能跳出集合工程和局部加工的階段。可知今後我國的建設只有從根本做起，所謂擒賊先擒王，抓住一個基本的環節（main link），然後提綱挈領，在最短的期限內，踏踏實實把經濟和技術的基礎奠定下來，才能真正消滅國防和經濟方面的弱點。那末，這個基本的環節到底在那里呢？不消說，在於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工業化的基礎，是一切製造工業之母，只有重工業發展起來了，整個的工業運輸和農業才有可能獲得根本的改造，並在新的技術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列寧曾經提醒他的國人說：「拯救俄羅斯的不只是農民經濟中的豐收，——這是不夠的，」

——也不只是供給農民以消費品的輕工業的好況——這也是不夠的——我們也必須有重工業……不拯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便不能建設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要滅亡而不成其爲獨立的國家。」（三七）這真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話。

我們知道，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可以說完全是一個發展重工業的計劃，即第二和第三個五年計劃也莫不著重重工業的發展。根據卡加諾維奇（L. Kaganovich）的報告，一九三三年重工業的出產約值一五、五〇〇百萬盧布（按一九二六——二七年度價格計算），到了一九三八年即值四二、五〇〇百萬盧布，前後比較計增百分之二七五，但同時蘇聯全部大規模工業的出產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四〇（三八）第三個五年計劃預計生產工具的生產將由一九三七年的五五、二〇〇百萬盧布增至一九四二年的一二二、〇〇〇百萬盧布，即增加百分之二〇三，而同時消費品的生產却只由四〇、三〇〇百萬盧布增至六八、〇〇〇百萬盧布，即增加百分之六九（三九）莫洛託夫特別指出：「第三個五年計劃將保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的飛躍進展，就中進展得特別迅速的就是工業，而首先就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四〇）

希特勒的兩個四年計劃也是把重工業的發展放在程序單裏的第一位。我們如果把過去七年間德國的生產財和消費財的出產作一比較，便可明顯地看出這個特點。德國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的戰後復興期間，生產財的出產計增加百分之五八，消費財的出產亦增加百分之四三，但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因受世界經濟